

妇女与革命



Viktor Bulla

1917年3月，女工在彼得格勒示威游行。条幅上写道：“工人和士兵同志，支持我们的要求”。

本文译自英文版《斯巴达克派》第59期，2006年春。

* * *

“‘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

今天，即使在各个先进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内的千百万妇女，依然过着贫困和家务缠身的、令人厌恶的和畜牲般的生活。在美国，对堕胎权的进一步攻击，优质保育设施的缺乏和对于大部分劳动妇女来说过于昂贵的现象，只是反女性偏见的其中两个例子。第三世界的妇女状况，则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坏千百倍。然而，即使在十五年前，苏联的妇女拥有国家维持的保育设施、完全的堕胎权、加入众多行业的权利，在经济上与她们的男性同事处于相当大程度的平等地位等的各种好处。简言之，前苏联妇女的地位，在一些方面远超于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

正是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为前苏联妇女得到的这些成果打下了基础。历史学者理查德·斯蒂茨

(Richard Stites)用下面的话说明，俄国革命不是表面的涂饰而已：

“[俄国革命]是一场经典的社会革命——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社会革命并不是一种可以从局限于权力中心、并限于颁布宣扬平等原则的法令的那种政权交替引发的现象。欠发达社会的真正社会革命既不以官职的重新分配而开始、亦不以财产的重新分配而结束：它是社会动员的结果。简言之，这意味着拥有充分计划、技巧和革命热情的人们在人民之中活动；这意味着运用一切激进宣传中最优越的成分：革命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讯息和信念，对那些顽固、无知和落后的人，进行教育、推动、激励和劝诱的工作。”

——斯蒂茨《俄国妇女解放运动：女权主义、虚无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1860-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苏维埃(工农委员会)夺取政权、粉碎沙皇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为这场彻底改造社会的尝试开辟了道路。地主贵族的庄园被废除、土地收归国有；工业在不久之后被集体化。新的工人国家迈出了以劳动者的利益为本而进行经济规划的第一步，并因此为劳动妇女带来了丰盛的成果。俄国革命试

(下续第11页)

俄国革命...

(上接第28页)

图动员妇女，全面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

在1991-92年的反革命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前苏联妇女的状况大幅度恶化，面对着与第三世界相似的局面：大规模失业、人均寿命急剧下跌和宗教落后(既有俄国东正教的，也包括伊斯兰教的)的复苏，只是其中的三个例子。从1991年到1997年，俄国国内生产总值下跌超过八成；根据官方低估的统计数字，同期的资本投资则下跌超过九成。到1990年代中，俄罗斯联邦的四成人口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之下、另外36%则仅仅高出此线，数以百万的人过着捱饥抵饿的生活。

妇女解放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布尔什维克党人认识到，如果经济没有质的发展，妇女解放只能是乌托邦的幻想。早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努力尽量发挥其掌握的资源的作用，尽一切力量，包括在党内成立专门针对妇女需要的妇女工作部(Zhenotdel)，去实现妇女解放的承诺。然而，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这一方面踏出每一步，都面临这个问题：没有大量资源的投入，工作的成效都受到全面的限制。和弗·伊·列宁共同领导俄国革命的里昂·托洛茨基解释，布尔什维克党人一开始就意识到：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革命前的俄罗斯充斥着落后的农民父权制。图见1910年的农村长老聚会。下：农妇像牛一样被加上马具牵引驳船。



RGAKFD

“国家的实际资源同共产党的计划和意图不相称。家庭不能‘废除’，而必须用别的东西代替它。妇女在‘普遍匮乏’的基础上是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的。经验很快地就证明了马克思在八十年前所表述的这个朴素的真理。”

——《被背叛了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12月版(根据1937年英文版翻译)

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可怕的贫困，源自从旧沙俄帝国继承而来的经济和社会上的落后状况。外国投资在大城市建立了现代的工厂，创造了得以在大多数人民为农民的国家发动革命的、一个密集而拥有强大力量的工人阶级。这个革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和农民只有一两代人的距离。工人支持了他们在农村的表兄弟姐妹们剥夺地主庄园、在耕作者之间分配土地的行动。工农之间的联盟是革命成功的关键。然而，广大小农同时也是社会和经济落后性的积累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俄国造成的毁灭，为血腥的国内战争(1918年至1920年)所加重。在国内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政府被迫同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干涉武装作战，战争带来的破坏，使俄国经济遭受了几十年的倒退。帝国主义者同时实行了经济封锁，将苏联隔绝于世界经济和世界分工之外。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将阶级社会及其各种压迫连根拔起所必需的物质丰富，只有通过以国际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最高的科学和技术水平才能实现。苏联工人国家处于的经济毁灭和孤立状况，为其走向官僚化施加了强大的物质压力。列宁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往往和托洛茨基联盟，同这种官僚化的压力在党内的政治表现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人明白，社会主义只能在世界性的基础上建成，他们为革命的国际扩展、特别是往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展进行了斗争；社会主义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的观念，是后来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为了把革命的官僚堕落正当化而提出的一种歪曲。

在1924年初，由斯大林领导的官僚阶层占据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人设想的妇女平等并没有得到完全实现。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放弃了国际革命的斗争，以官僚的歪曲和谎言百般地沾污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以致工人阶级到最后，在1991-92年间，没有起来保卫革命同叶利钦率领的资本主义复辟斗争。

俄国革命的爆发，开始了席卷全球的、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杀的革命斗争大潮。十月革命在国际上给予工人阶级强大的鼓舞。欧洲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在1918-19年间卷入了革命形势；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亦动荡不安。布尔什维克党人将苏联国家的相当大量资源投入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里，并为此成立了共产国际。然而，共产国际在欧洲各国的年轻支部，因为只在不久之前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工人群众组织的改良



Yevgeny Khaldei

1958年塔什干。实验中的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学生。集体计划经济为妇女地位——特别在苏联中亚地区——的大幅度提高奠定了基础。

主义领导层决裂，并不能像布尔什维克党一样起到革命先锋党的作用。改良主义的、亲资本主义和极度沙文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和军警积极合作，成功地镇压了德国在1918-19年间的无产阶级革命机遇。

因此，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一流的社会民主派政党对俄国革命的堕落负有主要的历史责任。尽管如此，社会民主派还和它们的资产阶级主子一起嚎叫，说列宁领导的早期布尔什维克政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说共产主义已经失败、资本主义“民主”比共产主义无限地优越。今天很多将共产主义和苏联工人

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堕落等同起来的左倾青年，在重复着社会民主派的这类言论；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认为等级制度本身就是压迫，而小规模生产、经济分散和以个人为基础的“解放的生活方式”则指出前进的方向。这些思想都是政治的死胡同。

尽管官僚层在1924年胜利，俄国革命因而堕落，体现为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推翻和计划经济的成立的、革命的核心成果仍然存在。在妇女的物质地位上，这些成果的存在是明显的。因此，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继承同斯大林和革命的堕落进行斗争的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的传统：为无条件军事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攻击而斗争，毫不妥协地同苏联国内外的一切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威胁斗争。与此同时，我们了解当权的官僚阶层是对工人国家生存的致命威胁。我们号召在苏联进行政治革命：驱逐官僚层，恢复苏维埃工人民主，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

布尔什维克妇女工作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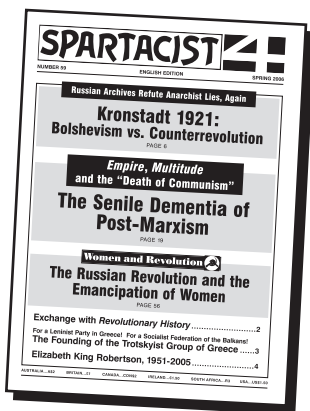
过去十五年出版的一系列书籍，显示了妇女在俄国革命后赢得的巨大成果。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人立即制定了民法，扫除了几百年的财产法和男性特权。温迪·戈德曼(Wendy Goldman)的重要著作《妇女、国家与革命：苏联家庭政策和社会生活(1917-1936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集中分析作为苏联党和国家妇女问题纲领的里程碑的1918、1926和1936年的三部《家庭法典》，论述苏联妇女政策的转折。被誉为“有史以来全世界最先进的家庭立法”的1918年《家庭法典》，在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同各个反对派系、主要是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之间的激烈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被1926年的《家庭法典》所取代。而在官方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中恢复家庭的地位和将堕胎非法化的1936年《家庭法典》，则以法律的形式总括了斯大林统治之下的苏联从争取妇女平等的斗争中的全面退却。

戈德曼的著作只是1991年以来，众多受惠于前苏联档案进一步开放的书籍的其中一本。巴巴拉·埃文斯·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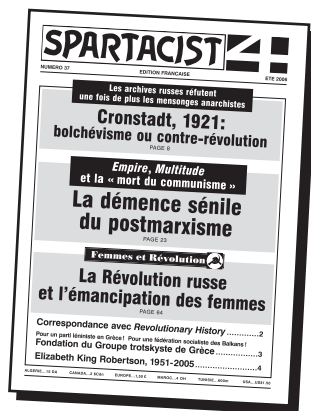
SPARTACIST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斯巴达克派》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的理论和文件性期刊，在国际执委会的指导下以四种语言发行。所有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出版物的订阅都包括此期刊。



English edition No. 59
(56 pages) US \$1.50



Edition française n° 37
(64 pages) 1,50 €/2 \$Cdn



Deutsche Ausgabe Nr. 25
(64 Seiten) 1,50 €



Edición en español No. 34
(64 págs.) Méx. \$ 5/US \$1/1,50 €

现可购买过去各期。请将支票付给并寄给：Spartacist Publishing Co., Box 1377 GPO, New York, NY 10116 美国



Duckworth

1920年的布尔什维克女性领导人（左起）：去世前不久的伊涅萨·阿尔曼德，与列宁在一起的叶连娜·斯塔索娃，孔科尔季娅·萨莫伊洛娃。



Viktor Bulla



Zhenshchiny Russkoi Revoliutsii

莱门茨(Barbara Evans Clements)以数名老党员的生平为中心的列传《布尔什维克女性》(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是另一本这样的著作。在这里, 克莱门茨集合了一个数百名老布尔什维克(1917年前入党的党员)女干部的资料库, 分析她们在出身、教育和党内活动等方面的趋向。

《布尔什维克女性》注目的显要党员有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17年在彼德格勒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叶连娜·斯塔索娃(Elena Stasova)。另一位是被曾为左派反对派成员、后来同托洛茨基决裂的维克托·瑟奇(Victor Serge)称为“[国内战争]初期涌现的其中一名最有才能的军事领袖”的叶夫根尼娅·博什(Evgeniia Bosh)(引自克莱门茨《布尔什维克女性》); 博什在1925年1月斯大林派革除托洛茨基军事人民委员职务时自杀。本书研究的, 还有列宁的亲密朋友和合作者、党妇女工作部的首任部长, 在1920年逝世前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的伊涅萨·阿尔曼德(Inessa Armand)。

书中比较少为人知的人物, 是1917年后主要从事妇女工作部实地工作的老干部, 孔科尔季娅·萨莫伊洛娃(Konkordiia Samoiloiva); 因支持反官僚的反对派而在1925年被解除妇女工作部部长职务的克拉夫季娅·尼古拉耶娃(Klavdiia Nikolaeva); 成为官僚中坚、斯大林统治时期人民委员会唯一女性成员的罗扎莉娅·泽姆利亚奇卡(Rozaliia Zemliachka); 还有从1925年直至1930年斯大林解散妇女工作部期间担任部长的阿历山德拉·阿尔秋希娜(Alexandra Artiukhina)。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妇女工作, 是建立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创立的传统之上的。《妇女与革命》最先的几期刊载了首任编辑戴尔·罗斯(Dale Ross)根据她的博士论文《1914-1921年彼得格勒妇女在战争、革命和反革命中的角色》(1973)写作的关于俄国革命和布



1923年的《女共产主义者》杂志(*Kommunistka*)展示1920年编辑部成员的图像: 正中是阿尔曼德的纪念像,(从顶部顺时针起)克鲁普斯卡娅, 布哈林, 科隆泰, 维诺格拉斯卡娅, 尼古拉耶娃, 奥利明斯基。

尔什维克妇女工作的原创研究。《妇女与革命》的第2和第3期(1971年9、10月号 and 1972年5月号)分两部份刊载了布尔什维克党人制定的、在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发布的“共产党妇女工作诸方法”。最近出现的资料, 更进一步确认和丰富了我们通过走布尔什维克道路、来争取妇女解放的决心。

在此后几期的篇幅里, 《妇女与革命》探讨了苏联妇女解放斗争其它各方面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第12期1976年夏季号刊载的《早期布尔什维克在苏联东方进行的妇女工作》。这篇文章详细的叙述了, 布尔什维克政府为改造穆斯林中亚地区饱受残酷压迫的妇女的状况所作出的英勇努力; 在那里, 为接触被隔离的妇女, 妇女工作部的积极分子采取了蒙上面纱进行工作的非常手段。限于篇幅, 我们不会在这篇文章里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对立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对女性的特殊压迫源于阶级社会本身, 也只能通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连根拔起。妇女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打开了她们通往解放的道路: 她们在生产线上的位置给她们和她们的男性同事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力量, 从而为妇女挣脱家庭制度束缚的社会独立建立基础。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分歧的核心问题, 在于什么是社会的主要对立关系: 女权主义者认为这是男女之间的对立关系; 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阶级的对立, 也就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对立, 才是社会的主要对立关系。劳动女性和她的男性同事之间, 比她和女性老板之间有更多共同之处; 而妇女的解放, 则是全体工人阶级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是妇女压迫的主要来源的观点, 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开

始的；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作出了家庭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制度，而是一种受历史转变支配的社会关系的论述。运用当时可以得到的资料，恩格斯在其经典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中，将家庭制度和国家的起源回溯至社会的阶级分裂。随着超越人类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社会剩余的出现，一个有闲的统治阶级可以依靠对这个剩余的私人占有而发展起来，人类因此而离开了石器时代的原始平等主义社会。家庭的核心地位源于其在财产继承中所起的作用，这一作用要求妇女专偶和在社会处于从属地位。恩格斯将这件事称为“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为了把社会全体能够支配的、包括闲暇时间在内的财富最大化，一个集体的、计划经济体系会尽力使所有成年人得到生产性的就业。与此相反，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周期里，每个资本主义企业的目的是将自己的利润率最大化。资本主义企业为了削减开支和增加利润，必然会减薪裁员，由此造成穷困的工人阶级和长期失业工人的群体，而劳动者则要接受冗长的工作时间。孤立在家庭里的妇女，构成了失业后备军的一大部分，她们在经济景气时被雇用，而萧条时则被“打发回厨房”。当妇女大量进入工作队伍时，资本家便会尝试削减男工的实际工资，致使需要集合两个在职成年人的收入，才能养活一个家庭。

家庭必须被替代而不能被废除的功能，就是它在培养下一代中所起的必要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广大青年人的命运就是当雇佣奴隶和资产阶级军队的炮灰，而家庭在训练青年服从权威方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家庭同时是反复灌输对社会意识发展起制动器作用的宗教落后思想的一个主要场所。

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在许多方面起有破坏和侵蚀家庭的作用(例如妇女的就业和公共教育)，但资本主义本身对妇女身受的双重压迫是不能提供任何系统的解决出路的，而且还一定会试图支撑被削弱的家庭制度。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同资本主义制度的争论只是她们在资本主义制度内的从属地位，因而她们主张对家务劳动进行再分工，增加男性的家庭责任分担。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试图把所有家务劳动转出到公共领域。正如(后来同托洛茨基联合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vgeny Preobrazhensky)所说的，“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要在两性之间寻求公平的分工，而是要把男女两性都从琐

碎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引自戈德曼《妇女、国家与革命》)。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用公共保育设施、食堂、洗衣房、带薪产假、免费医疗来完全取代家庭制度，并用特别措施使妇女完全地融入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去。

俄国的女权运动，是作为反对沙皇专政、试图将俄国现代化为资本主义工业国的，更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例如，在1906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后持续的社会动荡之中，三大女权主义组织(妇女平等权利联盟、妇女进步党和妇女互助慈善会)集中她们的力量，争取在新成立的杜马(即国会)中通过关于男女平等和赋予妇女选举权利的法案。当自由派占绝对多数的第一和第二届杜马被沙皇独裁政府解散后，俄国女权主义运动就进入了衰退状态。

对于劳动妇女来说，在1917年存在的主要“妇女问题”是反对已持续三年之久的血腥帝国主义战争。这一战争激发的二月暴动，是由广大妇女在国际妇女节那天的示威开始的。随着沙皇的退位和资产阶级民主临时政府的成立，大部分表面上的左派和改良主义的政党，包括俄国的女权主义者，都认为革命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因此，他们停止反对战争，并以“民主”的名义支持帝国主义屠杀的延续。

布尔什维克党人当时的斗争目标，是将工农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变成包括妇女在内的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统治机关，以及在不兼并其它国家的情况下、立即结束战争。明白妇女的解放不能同全体工人阶级的解放分开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妇女解放事业最优秀的战士。布尔什维克党人同时认识到，妇女的解放是不能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隔绝于世的情况下得到完全实现的，更不用说是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即使有革命政府的存在。

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妇女工作

俄国社会中充斥着最强烈的反妇女偏见。在1917年，脱离农奴制仅仅半个世纪的俄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他们生活在一个连最基本的现代基础设施建设也没有、没有集中污水处理、没有电力和铺筑道路的，由僵化的父权等级制支配的农村制度中。在那里无知和文盲是常态，迷信更是根深蒂固。古旧的“德沃尔”(dvor)家庭和村集体制度不但决定着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生计，同时亦强制着妇女地位低下的状况。这种



Kevin Mulhern photos

1918年11月，阿历山德拉·科隆泰(上)对第一届全俄女工代表大会的与会者发言。左：代表大会的与会者们。



CPSU CC Archive



RSFSR Artist

1926年，妇女工作部活跃分子在高加索的达吉斯坦聚会。这幅描绘社会和政治成果的1920年海报的标题是：“十月革命给工农妇女带来了什么”。

对妇女的极度压迫，是采用古旧技术的俄国农业的生产力低下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农妇承担着苦工的角色。例如，“巴特拉恰卡” (*batrachka*) 是被雇来做一个农季“老婆”的农工，如果她们在此期间怀孕就会被赶走。一位农妇是这样描述她的生活的：“在农村里，他们把妇女象马一样地使役。你为你的丈夫和他一家干一辈子的活，忍受打骂和种种欺辱，但你什么也做不了，到头来还是走投无路——你被婚姻缚住了。”（出处同上）

然而，到1914年时妇女已占俄国人数虽小却力量强大的工业劳动队伍的三分之一。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提出了这些妇女的切身需要的要求：同工同酬、带薪产假和在工厂里设立托儿设施（工厂托儿设施的缺乏对婴儿死亡率有严重的影响。多达三分之二的女工的婴儿在出生的第一年里死亡）。根据列宁在《怎么办？》（1902）中提出的作为人民的代言人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党努力保护劳动妇女，使她们免受虐待和遭丈夫殴打、并随时随地反对所有形式的歧视和压迫。这包括二月革命之后在工会中反对为解决失业问题而提出的首先解雇那些丈夫有工作的女工的提案。这个政策在普梯洛夫兵工厂、维堡钢厂和其它工厂里被施行，布尔什维克反对这样的做法，把它视为对无产阶级政治团结的威胁。数以百计的妇女在革命前就已是布尔什维克党员了，她们从事合法的和地下活动等党的各方面工作，在各地党的委员会中任干事、信差、鼓动者和撰稿人。

由于被家庭生活束缚在家里，许多妇女与社会和政治生活隔绝，因而可能成为落后意识的积累所在。但正如克拉拉·蔡特金 (Clara Zetkin) 在共产国际1921年的代表大会上所说的：“不是革命拥有广大的妇女，就是反革命将拥有她们。”（《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记录》）（我们的翻译）一战之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率先建立了面向妇女的“过渡组织”——通过党最有觉悟的干部同党联系在一起、为妇女权利和其它重要的政治问题而斗争、进行教育活动并出版报纸的一个特别组织。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进一步发展了他们德国同志这方面的成就，尤其重要地将党的妇女工作带进工厂中去。通过建立各种过渡组织、创办《女工》杂志 (*Rabotnitsa*)，和十月革命之后成立妇女工作部，布尔什维克党人成功地

动员了以前党无法接触的、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广大妇女。

针对当时劳动妇女极度关切的两大问题，《女工》杂志在彼德格勒召集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反对战争和高涨的物价。《女工》杂志在1917年10月召集的全彼得格勒女工第一次代表会议提前散会，以便代表们能参加起义；这次会议在起义成功后再召开。这次会议的成果之一，是通过了8小时标准工作日和禁止16岁以下童工的决议。会议的目的之一是动员非党女工参加起义，并争取她们认同苏维埃政府计划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的施政目标。

俄国的革命在其初始阶段就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城市和农村中劳动妇女对于这一革命历史使命的政治觉醒。就连最仇恨十月革命的政敌，象孟什维克那样主张回到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成功。在表现对无产阶级大众的蔑视的同时，孟什维克领袖尤利·马尔托夫 (Yuri Martov) 给他的同志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德 (Pavel Axelrod) 写道：

“对你来说一定难以想象的是，最近一段时期内（仅在我离开之前）出现了一种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烈而真实的狂热，对列宁、托洛茨基的崇拜和对我们的极度仇恨，这种狂热广泛存在于莫斯科的女工中，在工厂和作坊里都有。这种狂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妇女的文盲和无助感，使她们的大部分只能通过国家机制的手段被吸引到‘政治’中去（即通过无休止的教育课程和‘文化’鼓动团体、官方庆典和游行、还有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物质上的好处）。所以女工们写给《真理报》信中的那一类‘只是在十月革命后，我们女工才见到了太阳’的词句，并不是空洞的。”

——《致阿克雪里罗德的信》（1921年4月5日）。马尔托夫《1916-1922年书信集》，佛蒙特州本森镇察里德泽 (Chalidze) 出版社，1990年版。（我们的翻译）

早期苏联政府与1918年《家庭法典》

十月革命释放了向往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上的新社会的一股乐观主义的气象和热切期待。青年们激烈地讨论关于性关系、儿童抚育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家庭的性质的问题。文化领域也充满着创造活力，文化工作的重点和任务都因家庭不久后就会自行消亡的流行观点而转变（参见《早期苏联集体生活的规划：作为社会变革工具

的建筑艺术》。载英文版《妇女与革命》第11期，1976年春)

当年苏联立法给予妇女平等和自由的程度，是连今天经济最先进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都未曾达到的。然而，问题正如莫斯科省级法院主席捷利马霍维奇(A. T. Stelmakhovich)所简洁地指出的：“妇女的解放……如果没有保证每个工人物质上完全独立的经济基础，就是一个神话。”(戈德曼《妇女、国家与革命》)

在十月革命仅仅一个多月之后，苏维埃政权就颁布了确立民事婚姻和只需夫妇其中一方要求就允许离婚的两项法令，这个行动的成就远远超越了革命前的司法部、进步新闻记者们、女权主义者和杜马加起来的一切尝试。离婚在那一期间急剧上升。国家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委)在1918年10月通过的一部完整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清除了几个世纪的父权和教会权力，建立了一个以个人权利和两性平等为基础的新的法律原则。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人也废除了所有反对同性恋和两愿的性行为的法律。莫斯科社会卫生学院院长格里戈里·巴特基斯(Grigorii Batkis)在其《俄国的性革命》(1923)小册子中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立场：

“苏联立法建立在如下的原则上：

“只要没有人受到伤害、和没有任何人的利益受到侵犯，国家和社会就绝对不介入性事。”

——约翰·劳里森(John Lauritsen)和戴维·索尔斯塔德(David Thorstad)《早期的同性恋权利运动(1864-1935年)》(纽约Times Change Press 1974年版)

政府在1918年8月成立了由前孟什维克法律教授戈伊赫巴尔格(A. G. Goikhbar)为首的委员会，专责起草新的《家庭法典》。法律工作者们将这部《法典》描述为“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过渡时期的立法”，正如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本身，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预备性政权一样。(引自戈德曼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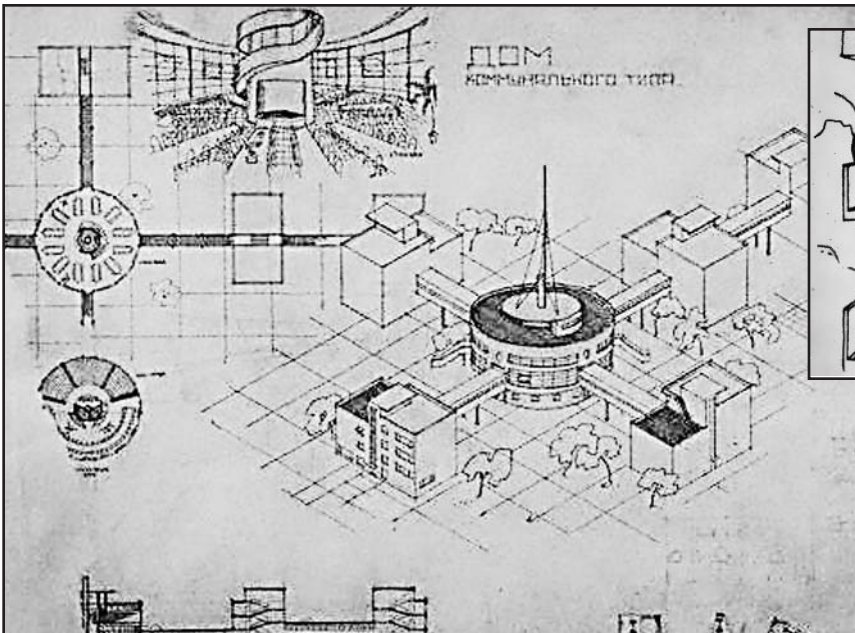
Arkady Shaikhet

1920年代的苏联保育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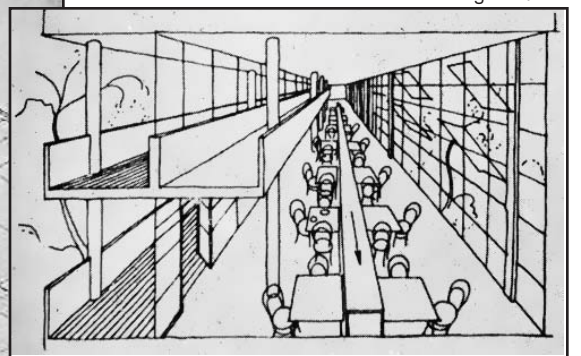
正如戈伊赫巴尔格所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因认为“家庭很快就会被一种建立在独立个人的基础上的、更合情理和更理性的区分所取代”而过于乐观地预期了“消除某些登记，例如，婚姻登记”的可能性。他补充说，“执政的无产阶级辩证地构造它的法律和法典，使它们存在的每一天都在削弱其存在的需要。”当“丈夫和妻子的枷锁”成为“过时”的废物时，家庭就会自行消亡，被建立在妇女平等之上的革命社会关系所取代。但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用苏联社会学家沃尔夫松(S. Ia. Volfson)的话说，婚姻的持续期间将“仅仅由配偶的互相爱好来决定。”(出处同上)而苏联建筑师萨布索维奇(L. Sabsovich)设想，把门锁上就完成了离婚的手续。

新的婚姻和离婚法例非常受欢迎。然而，由于妇女照顾孩子的传统责任以及她们找到和保持就业的更大困难，离婚对她们来说往往比男性更加麻烦。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时不能为所有的人提供就业的国家为残疾

Corbis



George Braziller



作为社会改造工具的建筑。1920年代末规划的集体生活和进餐设施的草图。



1923年妇女接受成为铁路工人的培训。妇女加入劳动队伍，打开了通往解放的道路。

的贫穷男女制定了赡养条例。1918年的《法典》废除了“婚生”和“非婚生”儿童的区别，而是十分小心地采用了“父母不在注册婚姻中的儿童”的措辞。这样，妇女就可向没有同其结婚的男性索赔子女抚养费。

1918年的《法典》也确立了父母要对18岁以下的子女履行抚养的义务，以及配偶任何一方享有自己财产的权利。在落实《法典》的各项措施时，法官偏向于作出对妇女和儿童有利的判决，理由是确保儿童的抚养费费用比保护男性被告的经济利益更重要。在一宗案件里，法官把子女抚养费分成三份，这是因为孩子的母亲当时同三个男子发生过性关系。

在对《法典》草案进行的争论中，戈伊赫巴尔格不得不反驳那些想完全废除婚姻的人。例如，一名叫罗斯拉韦茨(N. A. Roslavets)的乌克兰妇女代表建议中执委否决草案中关于婚姻的章节，否则就会偏离“作为个人自由条件之一的婚姻关系自由”。她说“我想不通为什么这部法律要强制规定一夫一妻制”。罗斯拉韦茨还反对(非常有限的)赡养条例，认为这“简直就是用钱买爱”(出处同上)。

戈伊赫巴尔格后来忆述道，“她们对我们尖叫：‘登记婚姻、正式婚姻，这还是社会主义吗？’”戈伊赫巴尔格当时的主要论点是，民事婚姻登记制度对同俄国东正教的中世纪落后势力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民事婚姻，人们就会诉诸宗教仪式，教堂就会兴旺起来。他把罗斯拉韦茨对草案的批评概括为“言论上的激进”但却是“行动上的反动”。戈伊赫巴尔格指出，赡养费只是适用于贫困的残疾人，而且立刻废除所有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他争论说，“我们必须在知道它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的同时，接受这[部法典]，因为社会主义立法几乎不会存在。到时只有有限的规范存在。”(出处同上)

不平衡和综合发展

十月革命把政权交给了一个在相对落后的国家里、数量小的工人阶级。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了，推测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工业化程度较高国家爆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不能预见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人期望俄国革命将激励欧洲经济先进各国的工人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而这些新的革命将向俄国无产阶级伸出援手。这一系列革命所产生的工人国家并不会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作为过渡政权，为无阶级差别和国家自行消亡

的、建立在国际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俄国工人阶级是在破坏了粮食供应、造成城镇大饥荒的三年世界大战之后夺取政权的。到国内战争结束时，全国已成一片废墟。交通系统崩溃，油煤无法运到城镇。无家可归和饥饿的儿童——别兹皮佐尔尼基(*besprizorniki*, 意即街童), 成群结队在农村和街头游荡。在俄国残酷的冬天里，作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写道，因为缺乏燃料，“住在中央暖气住宅的人们成群地死去。他们冻死，成套房子的冻死。”(出处同上)

当时生产力的崩溃是史无前例的。俄国国家和政府处于崩溃深渊的边缘。尽管布尔什维克党人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俄国的国民收入下跌到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工业产出则低于同水平的五分之一。到1921年，莫斯科人口减半，彼得格勒失去三分之二人口。当时俄国全国接连两年受到旱灾打击，风沙和蝗灾则在南部和西部地区造成饥荒。在受灾地区，三岁以下儿童死去九成至九成五；生还的则因双亲死去其一或皆亡而被抛弃，落得饥饿和无家可归。当时有食人的事件发生。

整个社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克莱门茨著作研究的布尔什维克女干部中，有百分之十三在1917至1921年间死去，当中大部分死于传染病。当中有死于霍乱的妇工部部长伊涅萨·阿尔曼德和萨莫伊洛娃。萨莫伊洛娃在伏尔加河流域从事党的工作时感染霍乱；被伏尔加河三角洲的状况深深震惊的她，在临终的数日激励地方的党委员会采取行动。

正如马克思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哥达纲领批判》1875)布尔什维克党人知道，因为持续数世纪的压迫和国家饱受破坏的事实，即使最民主的法律也不能保护最容易受攻击的群体：工人阶级妇女、尤其是农民妇女，她们继续过着痛苦和屈辱生活。在家庭被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保育完全取代之前，针对实际社会状况的法律是为创造新社会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必要一部分。

保护母亲

革命后，政府就立刻发动了为女工提供社会、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吸收她们就读培训和教育课程的运动。1918年的《劳动法典》规定，妇女享有最少每三小时内、半小时的带薪哺乳时间。为了保护孕妇和哺乳期

间的母亲，她们被禁止在晚间工作和加班。为了实现这些规定，需要同某些认为这是一项额外财政负担的国企经理进行不断的斗争。

对女工来说，苏联政府最重大的立法成就是1918年的产孕妇保险计划。这项计划是由首任社会福利人民委员、1920年至1922年间担任党的妇女部部长的阿历山德拉·科隆泰(Alexandra Kollontai)设计和推广的。计划规定产孕妇拥有八星期全薪产假、育婴间歇、工厂休息设施、免费产前产后护理和现金津贴等权利；并由隶属于卫生人民委员部的、以布尔什维克医生薇拉·列别杰娃(Vera Lebedeva)为首的母婴保护委员会管理。这项由产科诊所、咨询办公室、哺乳站、托儿所和母婴中心的网络组成的产孕妇保险计划，也许是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妇女之中最受欢迎的一项新政。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妇女通常得到以月经假期的形式的几天无薪假期。在保障女工的历史之中，苏联此举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与此同时，专家们进行了关于繁重劳动对妇女影响的研究。对此，一名学者写道：“维护工人的健康似乎是这时期里劳动保护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梅拉妮·伊利奇[Melanie Ilic]《苏联两次大战之间经济中的女工：从“保护”到“平等”》，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9年版)艰苦的劳动能导致经期的中断或延迟，这情况在农妇身上尤为常见。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即最大程度地为所有男女工人减少压力和从事工农业劳动的潜在危险的机械科技，则超越了当时苏联经济的能力。

免费和自主的堕胎权

在1920年，苏维埃政府发布推翻对堕胎的刑事处罚的法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这样做的政府：

“在旧社会的残余和各种困难的经济状况继续迫使部分妇女经受堕胎手术的情况下，卫生和社会福利人民委员部和司法人民委员部认为对堕胎实行刑事制裁并不恰当。有鉴于此，为保障妇女健康和保护人类，打击无知自私的牟利分子，兹决定：

“一. 堕胎免费。人工中止妊娠手术应在国立医院进行，以确保妇女手术期间最大可能的安全。”

——《苏俄卫生和社会福利人民委员部和司法人民委员部法令》。译自德文《共产妇女国际》，1921年4月号。载于英文版《妇女与革命》第34期，1988年春。

在执行这个法令的时候，资源的缺乏再次和庞大的

需求相冲突。同时因为短缺，在当时本身已经可怖的堕胎手术往往是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法律规定，一切堕胎手术必须由医院的医生施行，然而俄国缺乏足够的设施。城市女工得到优先待遇；而在农村，很多妇女没有办法得到国家设施的帮助。因为如此，尤其是助产士经手的、危险的堕胎手术继续发生，数以千计因而受伤的妇女要进医院接受治疗。

医生和公共卫生工作人员们指出，落后的俄国急需当时普遍缺乏的优质避孕工具。在1920年代中，母婴保护委员会正式宣布，所有咨询办公室和妇科诊所应当分发计划生育资讯。造成避孕工具短缺的一个因素，是橡胶一类原料的缺乏，而这是由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封锁所直接造成的。

戈德曼在承认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给与妇女合法和免费的堕胎权的国家的同时，宣称布尔什维克党人从不承认堕胎是妇女的权利，而只将其视为维护公共卫生的一种必要手段。当然，上述法令的其它地方将堕胎说成是“这种罪恶”，对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习惯只从顽固宗教分子听到这种字眼的我们，是会有诧异的感觉。然而，在没有抗生素和基本卫生问题依然十分严峻的1920年代俄国，堕胎比现在危险得多。布尔什维克党人关注保护母亲和儿童工作的进展，他们把这一工作视为无产阶级国家的责任和用公共办法取代家庭的一项主要目标。

戈德曼关于布尔什维克党人从不承认堕胎为妇女权利的宣称，被托洛茨基的说明所否定；与戈德曼宣称的恰恰相反，他指出堕胎是“妇女在公民、政治和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托洛茨基猛烈批评卑鄙的斯大林官僚层在1936年将堕胎刑事化，认为此事表明了“牧师的哲学也被赋予了宪兵的权利”：

“这些老爷似乎已经完全忘记，社会主义是要消除那些迫使妇女堕胎的原因，而不是借助于讨厌的警察干预妇女最隐秘的生活领域，来强迫妇女接受‘做母亲的快乐’。”

——《被背叛了的革命》

妇女工作部动员妇女群众

1919年成立的妇女工作部给党的各个散乱薄弱的妇女委员会注入了能量。它在动员俄国妇女投身到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1920年，萨莫伊洛娃报道，人们谈论着在妇女中间进行的“第二个十月革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Boris Ignatovich

左：国内战争期间的街童。苏维埃国家针对严重的无家可归儿童的问题作出了英勇的努力，此问题至1927年已有了显著的改善。
右：街童与少年先锋队在当年的五一节一同游行的情景。



Alexandr Staritsin Archive

1924年5月，莫斯科。
被选举为妇女代表的女工。
妇女代表会议是政治和解放的学校。

命”。(引自卡罗尔·尤班克斯·海登[Carol Eubanks Hayden]《女权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妇女工作部和俄国妇女解放的政治，1917-1930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79年)妇女工作部最根本的组织信条是“以行动做鼓动”。对此，历史学家理查德·斯蒂茨有这样的表述：“数以百计已经得到‘解脱’的妇女们呕心沥血地，将她们的信念、纲领和自信灌注到俄国农村和无产阶级的血液中”(斯蒂茨《俄国妇女解放运动》)。有如此众多的妇女成为苏联政府和党的成员的这个事实，说明了党对这种非比寻常的社会流动的支持。

妇女工作部进行这一工作的主要工具是其发展的、设计为政治和解放学校的“代表会议”系统。在这个系统下，每个工厂的女工在她们的同伴中选出一名派往妇女工作部为期三个月到六个月的代表。对女工来说，这种选举本身就是一种觉悟的进步。被选举的“妇女代表”戴着红色围巾作为职务标记，在各种公共活动的场所，如工厂、苏维埃、工会、学校、医院和食堂等，执行观察者和学徒的职责。当一个女代表在现实政治世界的体验结束后，她会向妇女工作部和她的同伴们报告自己在作为当选的政治家、管理者、宣传员和评论家的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一位观察家把女代表们描述为“对官僚、酒鬼、富农和半富农等所有反对苏维埃法律的人构成威胁的人物。”(出处同上)

妇女工作部除出版刊载关于妇女问题的主要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文章的《女共产主义者》(*Kommunistka*)杂志之外，还在许多全国和地方的党报上主办妇女专页。妇女工作部鼓励工人阶级妇女成为通讯员、向报刊投稿和发信。妇女工作部举办的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让不同地区、相差很大的大批妇女集合起来。妇女工作部举办的最后一个重要集会是在1927年的苏维埃妇女代表大会，它深刻见证了妇女工作部此前十年工作的成绩，在会妇女们展示了“力量和成就感”。(出处同上)

以公共生活取代家庭生活

苏俄实现公共生活的早期措施受到了国内战争很深的影响。为了动员民众参战，布尔什维克党人实行了以

包括国家配给、公共食堂、为儿童免费提供食物和以实物支付工资等为内容的“战时共产主义”。到1920年1月，彼得格勒有一百万人在公共食堂进餐；在莫斯科，百分之九十三的市民以这样的方式吃饭。公共食堂饭菜的质量不好，但在当时的革命乐观主义气氛中，这只被视为暂时的困难。与接踵而来的严酷现实相比，许多人在后来都怀念当时在“战时共产主义”下的共同生活所许诺的理想未来。党的领导人之一I·斯捷潘诺夫(I. Stepanov)这样的记录了这种怀旧之情：

“当时我们所有的成年人都发了疯似的饿得不可开交，但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向全世界说：孩子们是我们共和国的第一批幸运的公民。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朝着实现从经济利益中解放爱情，从家庭奴役中解放妇女的道路前进。”

——引自戈德曼著作

把妇女从家居的牢狱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关键是儿童养育的社会化。每个人都应享有接受社会的全部文化和社会利益的权利、而不应受到社会和经济地位的限制，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就是建立在这种概念之上的。在1919年召开的全俄儿童保护大会中，代表们争论了关于儿童保育的各种理论，以及在养育幼儿的过程中国家同父母相比的参与程度问题。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安娜·叶利扎罗娃(Anna Elizarova)的话概括了与会大多数人的普遍见解：“必须消除不幸的孩子无家可归的情况。所有的儿童都是国家的孩子。”(出处同上)

此前一年颁布的《家庭法典》中的一项条文完全禁止了领养，而由国家承担照顾孤儿的责任。在农民把领养作为廉价劳动力来源臭名昭著的俄国，这项措施是特别重要的。取代这种情况的，是政府将担任使所有儿童得到良好养育的任务。

然而，在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依然存在。在俄国，国家没有能力照顾数以百万计的无家可归的孤儿：街童们。这是在革命前就存在的问题，七年的战争和随后的饥荒使无家可归的孤儿人数到1922年上升至七百五十万人。政府授权为16岁以下儿童免费供食；为此厨房和收留所被建立了起来，旧贵族的庄园被改造成孤儿居住的地方，这些措施只有部分的成功。戈德曼认识到了由资源缺乏而不能满足需要的恶性循环：“没有日

间托儿所，许多单身母亲就无法外出寻找工作，没有工作，她们就不能抚养孩子，那些孩子就会从贫穷的家庭中逃走，去加入街童的行列。”（出处同上）虽然街童的数目在1921年饥荒之后的十年中有所下降，但直到1930年代初之后，这些街童仍然是苏联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新经济政策的临时退却

在1920年末，随着国内战争接近尾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局限就表现得更明显了。工业几乎崩溃，政治上最先进的工人或是在国内战争中牺牲，或是被吸收到国家和党的行政中去；剩下的许多工人又回到了农村，靠土地维持艰苦的生计。南方的农民开始反抗对粮食的强制征收。（见《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主义同反革命的对立》。载于英文版《斯巴达克派》第59期，2006年春）

为了恢复生产和保持与农民的联盟，列宁在1921年初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以对农产品征税的方法取代了强制征收粮食的政策，这样，农民可以在公开的市场上出卖大量粮食。政府试图稳定货币，结束了对食物和短缺消费品的配给，并容许牟利的消费品小生产和分配。虽然这些向市场势力的让步在很大程度上复苏了经济，但它们同时也加剧了原有的不平衡，即对重工业的投资很少或没有，原已存在的一批富农以农村里其他穷人为代价变得更富。一层新贵的小生产者 and 商人“耐普曼”（NEPmen）因此十分活跃。

正如所料，新经济政策对妇女和儿童的状况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直到1927年的整个时期里，妇女遭受了持续增长的失业，并被排挤回纺织和轻工业等“传统的”区域里。“自由市场”的常规意味着在雇用和解雇方面对妇女的歧视，特别因为带薪产假和提供对孕妇和哺乳母亲的在职保护需要经费。象集体伙食这样的以前免费的公共服务也要缴费了。半数的托儿中心和为单身母亲提供的住所不得被关闭了，这损害了解放妇女的任何努力：母亲们只有很有限的机会去学习、增长技能、和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

Corbis



对妇女来说，新经济政策最具悲剧性的后果可能就是卖淫的重新出现。卖淫在苏俄并不违法。相反地，政府试图做蔡特金记述列宁所说的，使“妓女回到生产性的工作中去，为她在社会经济中找到一席之地。”（蔡特金《我对列宁的回忆》。《妇女的解放》1934年版）1921年的一个政府委员会又重申了对国家介入私人事务的反对：

“在同卖淫做斗争的过程中，政府没有任何侵入性关系领域的企图，这是因为在那个领域里，任何强迫的、管制性的影响只能扭曲自由和独立的经济公民的性自决权利。”

——伊丽莎白·A·伍德(Elizabeth A. Wood)《芭芭和同志：革命俄国的性别和政治》(Bloomington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城市娼妓最大的一部分就是由失业妇女和无家可归的街童组成的。

戈德曼指出，在1922年一次关于妇女劳动的会议上，代表们愤怒地提出要关注“用以保护母婴的服务设施因为新经济政策对国家开支造成的压力，而所处的灾难性的状况。”（戈德曼《妇女、国家与革命》）与会代表们强调，妇女面对的各种问题是“同工人阶级的整体状况紧密相连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视为是与无产阶级国家没有相干的事情”。政府尝试用自愿贡献和义工的办法填补已不存在的资源；而为了制止对妇女的歧视，各人民委员部发布了多项政令。

然而，这些措施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在1923年初，一场关于应否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辩论，在主要的妇女干部之间爆发。她们当中有认为党的妇女工作的范围应当扩大的薇拉·戈卢别娃(Vera Golubeva)和亚历山德拉·科隆泰。妇女工作部副部长戈卢别娃争论说，随着妇女失业的不断增长，党应当将它的工作范围扩展至工人阶级以外的其它社会成份，吸收失业妇女和农妇加入特别的（“过渡性”）工作组织，将她们和党联结起来。在1923年4月的党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到最后，苏联政府别无选择，只好诉诸新经济政策。另一个选择，即在社会崩溃的情况下继续战时共产



Zhenshiny
Russkoi
Revolyutsii

左端：1918年莫斯科，妇女与男性一同参加军事训练。苏维埃的女军事领导人包括1917年布尔什维克中央军事组织的成员叶连娜·罗兹米罗维奇(左)和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指挥官叶夫根尼娅·博什(下，摄于1925年)。

Nezakonechnoe Pis'mo



主义的政策，将会引发大规模农民叛乱和反革命。但新经济政策本身亦蕴含这种危险。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资产阶级倾向便有了更广阔的活动余地。”（《被背叛了的革命》）即使在国家被孤立和经济虚弱的限制之下，妇女地位的下降决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由围绕可变的政策的政治斗争所决定的。

事实上，即使在当时的物质条件的框架下，左派反对派提倡的广泛政策，是有可能为实际地改善妇女的状况而打开一条道路的。假如反对派在1923年提出的有系统的工业化计划得以实行，新经济政策滋长的资产阶级倾向会被削弱；妇女在工业的就业会大量增加，厂长们行使职责的态度和方法也会因而改变。工业管理的队伍之中，在工资和就业方面对女工的歧视的一类官僚堕落的表现，也可以通过斗争被逆转。

“农民停滞的汪洋大海”

布尔什维克革命解放妇女的目标同俄国社会实际环境最剧烈的冲突，是在农村发生的。1922年的《土地法典》废除了土地、水源、森林和矿物的私有产权，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法律规定，所有公民，不论性别、宗教信仰或民族，都有使用土地的权利；而每个成年人在“斯霍德”（*skhod*：村会议）都享有发言权。《家庭法典》赋予个人分居、离婚、接受赡养费和儿童抚养费的权利。极度贫困加深了法律同现实生活之间的鸿沟，这使很多农民家庭几乎不可能兑现法律赋予妇女的合法权利。家庭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父权决定农村生活的制度的情况一日存在，农民——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都不能获得苏联民法所允诺的个人自由。

作为俄国革命性质本身的一个内在问题，这些矛盾并不能通过立法解决。队伍相对细小的俄国无产阶级，因为全力支持农民对封建野蛮制度的斗争，才得以实行其革命专政。然而，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必须超越废除沙皇专制所提出的那些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正如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爆发之前就预测到的，当工作日长度、解决失业和保护农业无产阶级利益等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农民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对抗也将随着工人政府政策的明确化和由一般民主政策变为阶级政策而逐渐增长。”（《总结与展望》1906）在农村根除封建社会关系的深刻过程，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兴建学校、道路和医院，以及农业机械化等必须的基础设施。布尔什维克冀望从先进欧洲国家胜利的工人革命得到技术资源，使俄国无产阶级可以将集体农业的好处带给广大农民。

司法人民委员部成立了数个委员会，专责调查农村妇女和儿童所面对的各种互相关联的复杂问题。而在农民的强烈反对之前，苏联的法律工作者坚持了维护平等权利的政策。例如，农村的土地所有权是以男性支配的家庭单位“德沃尔”为基础的，而赡养费金额则是由家庭资产多寡所决定。农民为了减少法庭可以判给离婚妇女的财产、和摆脱交付赡养费的责任，往往在虚构家庭单位分配方面搞小动作。土地和司法两人民委员部的行政人员多次拒绝农民废除离婚权和赡养费的要求，坚持维护易受危害的、弱势群体和无地农妇的权益。在增加粮食产量为国家重点目标的时期里，土地和家庭两部法典确立了可以造成农庄面积减小和粮食减产的一些妇女权利。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莫斯科委员会宣布：“免除‘德沃尔’承担赡养费的责任，就意味着把我们的苏维埃法律淹没在农民停滞的汪洋大海之中。”

尽管执行遭遇的困难重重，苏维埃国家的法律还是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新经济政策下的私人农产品市场。

有一定的效果。梅勒尼科娃，一名被丈夫逐出家门的贫穷“巴特拉恰卡”，在法庭上对法官说：“我在村里听到现在有了这条法律，不可以再这样羞辱妇女了。”（引自戈德曼著作）苏联政府在农村建立的新制度和对其日常生活的变革，尽管开始时往往因为恐惧、无知和传统带来的惰性而遭到相当多的反抗，当这些政策正常运作后，在1920年代初期和中期整个时期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是农妇的支持。

党的教育工作、妇女工作部的活动和妇女新的法律权利，给人数少、但显著的少数农妇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次妇女大会的代表们骄傲地表述，她们以单身女性的身份争取土地权益、出席村会议和组织妇女农业合作社的斗争。非婚生儿童的母亲和离婚农妇，公然反抗数世纪的父权传统，在法庭上控诉家庭，争取获得儿童抚养费 and 赡养费的权利。

日常生活的各种问题

在1923年，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了一场关于怎样改善“贝特”（*byt*）——日常生活素质的问题的讨论。这个看似平庸的问题，却触及创造全新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斗争的中心。在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作为“日常关系”的政治棱镜的妇女解放问题，正是这场斗争的核心。在二十世纪初贫穷落后的俄国，没有一个问题象妇女解放的问题一样，影响群众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当时俄国群众承受的持续几百年的风俗、社会尊卑习惯和反动宗教势力的重压，可以同今天的伊朗和印度相比。正如托洛茨基在这次讨论两年后指出：“衡量我们进步的最准确的办法，是我们究竟实行了什么实际的措施，来改善母亲和儿童的地位……母亲问题的深刻程度，是以母亲本身是我们经济和文化工作中一切关键部分的一个活生生的交汇点的事实而表现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妇女和保护母亲》。《妇女与家庭》1925年12月）

当时，即使在党员之中，竟时有可耻地嘲讽妇女工作部为“芭芭委员会（*bab-kom*）”和“芭芭中心（*tsentro-baba*）”的现象（“芭芭”是俄语中对妇女的一种蔑称）。蔡特金回忆列宁说过的一段话：

“我们在妇女群众之中进行的共产主义工作，和我们一般的政治工作，都涉及对男性进行大量的教育工作。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必须根除在党内和群众之中存在的那些旧奴隶主的观

点。和这项任务同样迫切的，是组成一个受过彻底的理论和实践训练的、由男女两性同志构成的工作集体，在劳动妇女之中进行党的工作。”

——蔡特金《我对列宁的回忆》

开始一种新的和更高的家庭生活方式所必须的，不论新的社会组织抑或物质条件，在当时都不存在——而这种家庭生活方式无论如何都需要经过几代人的演化才能实现。事实上，在社会意义上的妇女平等，有可能是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最后的一种需要完全实现的解放，正如对女性的压迫是历史上第一种非阶级的社会从属关系一样。

托洛茨基撰写了一系列诸如《从旧家庭到新家庭》和《伏特加、宗教和电影》（都写于1923年7月）讨论“贝特”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录在《日常生活的各种问题》文集之中。当然，托洛茨基强调了物质极大丰富对实现“文化”——对他来说，不止是狭义的艺术、而是人类在一切领域内的全部努力——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只有在先进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真正地谈得上“选择”和“自由”。尽管如此，托洛茨基同时亦提倡在日常生活之中鼓励志愿行动。

托洛茨基的这些著作，引来了妇女工作部成员波利娜·维诺格拉斯卡娅(Polina Vinogradskaja)的猛烈批评。维诺格拉斯卡娅争论说问题可以还原为政府的缺乏主动，反对对“贝特”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讨论。但托洛茨基坚持，这种讨论是社会发展必然的一部分：

“从过去继承而来的各种物质基础，和新的心理态度，都构成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烹饪和家务的事情是家庭概念的一部分，但在苏联社会的环境下正在形成的丈夫、妻子、子女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为丈夫和孩子们等等所带来的各项新的任务、目标、权利和义务……也是家庭概念的一部分

“获取关于日常生活的自觉知识的目的，正是为了能够在劳动群众自己眼前生动地、具体地和有说服力地展现，生活方式已经脱离的物质躯壳同新的[社会]关系和需求之间的各种矛盾。”

——《反对进步的和不进步的官僚主义》(1923年8月)
载于《日常生活的各种问题》

在革命的过程中，劳动群众并不是以被动的物体而出现的，他们扮演的恰恰是不可缺少的必要角色。例如，托洛茨基在《从旧家庭到新家庭》一文中建议，思想比较向前的人们应该“现在就组织起集体的家务管理单位”，并指出这是“一种最初的，但仍然非常不完全的接近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尝试”。尽管这种亲社会主义的志愿行动，在反对党和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堕落的政治斗争中并不起主要的作用，它们在1920年代苏俄的困难条件下是完全可能实行的。

革命的堕落

这些在1923年，关于如何处理共产主义的妇女解放纲领同俄国可怕的物质匮乏之间的令人痛苦的矛盾的辩论，是在决定革命是否会堕落的决战的前夕发生的。俄国的贫困造成了促进官僚畸形的巨大压力。新经济政策之下的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压力。托洛茨基之后在他关于斯大林主义堕落的开创性著作里，作出了这样的解释：

“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缺乏消费品，因此便引起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如果商店里的货物充足，购买者就可以随时去买。如果货物很少，购买者就不能不排队。而在队排得很长的時候，就必须指派一个警察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苏联官僚的权力的起点。它‘知道’什么人可以得到东西，而什么人必须等待。”

——《被背叛了的革命》



Dietz Verlag Berlin photos

1923年末或1924年初，苏联儿童为德国的受饥饿儿童筹集团结基金。下：1923年的革命高潮时，8月在柏林举行的反对库诺(Cuno)政府的总罢工。



这些物质压力，最后不可避免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在1922年3月被任命为总书记的斯大林，大大增加了党务人员的工资、福利和物质特权，成为了新官僚阶层利益的代言人。在斯大林的任命后不久，列宁遭受了严重的中风；到1922年年底列宁才能恢复工作几个月，在此期间他督促托洛茨基对党内发展中的官僚阶层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详见《对托洛茨基和俄国左派反对派的批判总结》。载于英文版《斯巴达克派》第56期，2001年春）。列宁在1922年12月后因多次中风，在1924年1月逝世前一直处于无法工作的状态。

斯大林和两名政治局成员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在苏联领导内建立了秘密的“三驾马车”，竭力地阻挡托洛茨基地位的上升。托洛茨基认识到，苏联政府一日不能向农民提供价廉的工业和消费品，工农联盟就会继续的脆弱下去。他因此提倡增加重工业投资和实行集中的政府经济计划。官僚层抵制了这个建议，宁愿继续新经济政策，并越来越迁就于富农和耐普曼的各种经济压力。

在1923年夏，对经济问题的日益增长的不满以罢工的形式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爆发出来。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一系列书信中，托洛茨基要求党立即发动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和设计进行工业投资的计划。四十六名担任领导地位的党员（包括女军事领袖叶夫根尼娅·博什）签署了一份内容相似的声明。这个松散的反官僚主

义的反对派和在党报《真理报》上连载的关于“新方针”的建议，一时间得到了热烈的支持。

与此同时，德国陷入了革命危机、工人革命可能随时爆发，这给苏联工人国家带来了孤立将快结束的希望。当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和德国共产党不能掌握1923年夏展开的革命机遇、并可耻地取消预定10月底举行的武装起义时，消沉低落的情绪席卷了俄国。（详见《关于德国1923年和共产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批判》。载于英文版《斯巴达克派》第56期，2001年春）

在直后的党内讨论之中，为消灭反对派，三驾马车动用了一切手段。在1924年1月举行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中，代表选举被完全操纵，以至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尽管得到彼德格勒、莫斯科和一些较小城镇的党组织的强力支持，在全部124名代表席位中只当选了3名。三驾马车在这次代表会议的胜利，标志着革命堕落的转折点。在同月列宁逝世后，三驾马车发动了一场大量招收党员的运动（所谓“列宁征集”），接受政治落后的工人、各式各样的投机分子、耐普曼以及其它不良分子入党。这开始了党从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转变为占据苏联国家顶点的反复无常的官僚机关的过程。

在1924年年底，随着斯大林宣布苏联可以不用依靠其它国家的革命，而独自建成社会主义的荒唐思想，官僚层的胜利提出了它的纲领。在此后的十五年，尽管苏联官僚层在和各个帝国主义列强谋求彻底妥协、和注定失败的鲁莽冒进政策之间左右摇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依然是不断演变的斯大林主义教条的主体。共产国际从争取国际工人革命的党，被改变成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

在苏联国内，官僚层开始放宽原来的新经济政策法例；这些法例在容许农产品的自由贸易的同时，对劳动力的雇佣和土地的买卖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用现在和斯大林结盟的尼古拉·布哈林的话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以“蜗牛爬行的速度”进行。官僚层对新经济政策小商贩和落后的农民“德沃尔”的讨好，给苏联妇女和儿童带来了严重和不利的后果。在1924年4月，一项下放青少年到农业的法令被公布。禁止农民收养儿童的条文实际上被推翻。在1926年，约一万九千名无家可归的儿童被逐出国家设立的儿童之家、分散下放到农户；在那

里这些孩子用几百年如一的木犁耕种、用镰刀和长柄大镰刀收割粮食。

从1926年中旬到1927年末，托洛茨基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联盟；后者因应他们在列宁格勒（前称彼德格勒）和莫斯科的无产阶级支持者的要求，同斯大林决裂。他们组成的联合反对派同“一国社会主义”的政策进行斗争，并为国际革命的展望而奋斗。除了主张通过对富农征税来筹集建设重工业的资金外，联合反对派为实现农民自愿集体化的政策而斗争，主张“有步骤地、逐渐地使这个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指中农]可以得到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集体经济的好处。”（《反对派纲领》1927年9月。载于托洛茨基《[1926-27年]左派反对派的挑战》，纽约 Pathfinder Press 1980年版）

从1924年开始，妇女工作部就直接涉及了党内的派系斗争；部内的许多著名的积极分子，包括部长克拉夫季娅·尼古拉耶娃，都成为了反对派的支持者。尼古拉耶娃在1925年被革职，职务由斯大林的支持者阿历山德拉·阿尔秋希娜接管。在对季诺维也夫及其列宁格勒组织进行的斗争里，阿尔秋希娜为斯大林派动员妇女工作部的人员，用以保存“团结的、坚固的、有纪律的列宁主义的党”。（引自海登著作）阿尔秋希娜宣称，“平等”的口号，会令女工误以为她们应该得到同更熟练的男工一样的工资，并争论说妇女工作部应该向女工解释工资差距为什么是必要的。与此成强烈对比，联合反对派的纲领主张女工应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并主张“向女工提供学习熟练技术的必需手段。”（《反对派纲领》）

斯大林牢固地控制了党和国家的机关，使他可以诬蔑和粉碎联合反对派。联合反对派大部分的领导人在1927年末被开除党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斯大林投降，而托洛茨基和许多联合反对派的主要成员则被流放到边疆。党内生活的官僚化使妇女工作部士气低落。在1927年，妇女工作部各次代表会议的出席率大幅度下降——从以前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下降到低至百分之四十至六十。

1926年的《家庭法典》

苏联党和国家的官僚化并不是一个迅速和一致的过程。官僚层需要几年的时间才完全地扑灭革命觉悟，而



在1928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左派反对派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示威。条幅写道：“不用言语，而用行动向右派开火，反对富农、耐普曼和官僚”和“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左：快速工业化的引进将大量的妇女投入社会生产。1930年乌克兰的煤矿女工。

Robert B. Luce, Inc.



右：这幅1931年海报的题为：“打倒厨房奴役！我们要求新生活”。

后者在俄国饱受破坏的情况下亦被削弱。围绕1926年《家庭法典》的激烈辩论，只是苏联政治生活的某些部分还有深入的公共讨论的一个例子。布尔什维克党人认识到，社会关系在革命之后会继续演变。作为过渡性法例而起草的1918年《家庭法典》，从未被视为最后的定本。围绕家庭政策的论争和讨论，在整个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里从未停止过。在1923年，起草新家庭法典的委员会成立。在1925年10月，在数易其稿和激烈的公共辩论后，起草委员会将新法案提交中执委。接着的是又一年的全国性讨论。

1926年的《家庭法典》标志了苏联家庭政策从革命早年解放的激动、到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在1936年恢复家庭制度而堕落的中间点。到1925-26年，主张废除一切婚姻法规的议论已沉寂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提倡承认“事实”婚姻（即英美普通法婚姻）的倾向的较宽松政策的人物同更保守势力的冲突。主张制定一部更严格的民法的行列中，大部分是农民，但同时亦包括一些工人阶级妇女，她们指出在家庭被社会手段完全取代还可能的社会里，妇女和儿童所处的弱势地位。

1926年《家庭法典》对1918年法例修改的条款，包括将赡养费的适用对象从残疾人扩大到包括健全的失业人员；和将婚姻期间得到的财产赋予共同财产，取代之之前婚姻双方只能保留自己的财产的规定。1926年的《法典》同时让离婚变得更加方便：因为夫妇一方只需简单地将离婚的意愿申报即可，有所谓“明信片离婚”的说法；离婚需要出庭的规定被取消。围绕1926年《法典》的最大争议是政府承认事实婚姻，即未经注册的同居人员，和正式结婚的夫妇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新条款的司法难处，在于民事登记以外的婚姻的定义问题。因为自然地，在法庭之中，男女双方很可能对婚姻有没有存在过而发生争执。百分之四十五的赡养费诉讼，是由怀孕时被抛弃的未婚妇女提出的。

对许多技术较差、教育程度较低、较难得到体面工资甚至工作的妇女来说，简便的离婚往往意味着她们和孩子们被一个行使“自由婚姻”权利的丈夫抛弃到贫困和痛苦的生活中。在没有工作、教育和国家支持的体面的保育设施的情况下，妇女和儿童不能自立的状况，不能被简便的离婚法例改变。正如一位妇女在《女工》杂志的一篇文章所解释的：“大多数的妇女，比男性更落后、学历更低、亦因此更难自立……结婚、生儿育女、成为厨房奴隶，然后被丈夫抛弃——对妇女来说是十分

痛苦的事。因为如此，我反对简便的离婚。”另一位妇女指出：“我们必须为家庭的保存而斗争，在国家不能照顾所有孩子的情况下赡养费是必要的。”（引自温迪·Z·戈德曼[Wendy Z. Goldman]《工人阶级妇女和家庭的“自行消亡”》，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拉比诺维茨[Rabinowitch]及斯蒂茨编《新经济政策中的俄国》，Bloomington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些令人痛苦的矛盾，强调了家庭必须被替代、而不能干脆被废除的赤裸裸的事实。

围绕《法典》草案的分歧尽管不是明显地分为左派和右派，但这场讨论和党内的其它辩论有相似的地方，亦同样反映了各种阶级力量的压力。反对《法典》草案的人一般趋向于反映农民的影响。农民强烈反对承认事实婚姻和简便离婚，认为这些政策对家庭的经济团结和稳定构成威胁，同时也是“搞阴谋的女人”、“社会和道德混乱”和“放荡”造成的结果。（戈德曼《妇女、国家与革命》）

据我们所知，联合反对派对《法典》没有正式的立场，但反对派成员有参加这场辩论。在1927年和托洛茨基一齐被开除党籍的亚历山大·别洛博罗多夫(Alexander Beloborodov)，对《法典》有很多保留；他特别关注“只要我们不能安排儿童接受社群教育，要求儿童在家庭长大的情况继续下去”时，家庭不稳定对儿童的影响。（引自鲁道夫·施莱辛格[Rudolph Schelesinger]《苏俄转变中的态度：苏联的家庭》，伦敦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49年版）托洛茨基本人在1925年12月7日的全苏第三次保护母子会议上发言，谴责反对承认事实婚姻的言论：

“同志们，这[种反对意见]的荒谬程度使你不由得想想：我们是真的生活在一个以社会主义的手段改变自己的社会吗？……这种对妇女的态度不仅不是共产主义的，还是反动和市侩到极点的。谁能想到，承担每次、不论如何短暂的婚姻的后果的妇女，她们的权益在我国是能够被过分热心地保护的？……这种症状说明了，在我们的传统观点、概念和习俗之中，有许多愚笨的东西，这都是要用攻城锤敲破的。”

——托洛茨基《保护母亲和争取文化的斗争》。
载于《妇女与家庭》

农业强制集体化和五年计划

到1928年，官僚层鼓励富农“发财”的政策带来了反对派此前预测的灾难：因为所得不能买到多少东西、卖粮给国家没有物质刺激，富农开始囤积粮食。不能养

活城镇的斯大林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和盟友布哈林翻面，在四个月之间将全国一半农民集体化。农民则以破坏回应，杀死牲畜，包括全国一半的马匹。在此后延续至1930年代初的社会动荡中，有超过三百万人死去。

与此同时，斯大林抛弃了以“蜗牛爬行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以鲁莽和草菅人命的速度，采纳了急需的工业化计划。由此而来的经济发展为劳动妇女的状况带来了质的改变。为促进妇女就业，街区和工厂一夜之间设立了保育中心和公共食堂。一位宣传员号召“打倒厨房！”：

“我们要毁灭这座小监狱！我们要从家务中解放百万妇女；她们想和其他人一样的工作。在工厂的厨房里，一个人一天可以做五十到一百份晚餐。我们要迫使机器给我们削土豆、洗碗、切面包、搅汤、做冰淇淋。”

“平底锅是党小组的敌人”和“去掉坛坛罐罐”成了党的口号。（斯蒂茨《俄国妇女解放运动》）

然而，苏联的经济计划是以官僚命令、而不是以工人的民主投入为基础的。工业化的成果固然十分可观，但这是以产品质量差劣和官僚的效率低下为代价的。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苏联是二十世纪唯一一个从落后的、压倒性的农民的国家发展成先进工业强国的例子。这确定了即使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废除资本主义、建立集体计划经济，对增进人类福利、尤其是妇女地位的强大动力。就是因为这里的工业发展，使苏联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牺牲二千七百万苏联公民的重大代价，击退希特勒大军的侵袭。与此同时，官僚层妨碍了社会的发展，他们浪费、镇压和反复无常；同时极力阻止唯一真正能长远地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国际革命。

尽管妇女状况在工业化期间大步地向前迈进，官僚层抛弃了争取妇女解放的共产主义政策。官僚层使用当

斯大林对家庭的美化，包括授予生育孩子的“光荣母亲”奖牌。下：这个有十个孩子的哈萨克妇女，被授予“英雄母亲”的荣誉。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时的冒险主义词句来掩盖其退却。苏联政府在1930年荒唐地宣布妇女问题已被正式解决。妇女工作部同时被取消；为此铺路的是1926年国际妇女书记处被解散、降级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妇女部。妇女工作部的解散是在1929年以党务“改组”、宣称妇女工作应成为全党工作的幌子下提出的。但这些从革命时期借来的词句，如今只是无行动和退却的借口。

1936年和“社会主义家庭”的胜利

在1929年，俄共仍然主张家庭的自行消亡。到1936至37年，当俄共的堕落已经完成的时候，斯大林主义的教条宣称这种主张是一个“粗劣的错误”，进而号召“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重建家庭”。与此同时，在1936年通过的第三部《家庭法典》，使离婚更加困难：离婚人必须出庭、缴交更高的费用，而且离婚的事实要在户口本上作登记。《法典》认为这是为了避免“破坏社会主义群体生活的，对此权利的不法滥用。”（施莱辛格《苏联的家庭》）

官方对家庭生活的颂扬和从布尔什维克离婚和堕胎政策的退却，是篡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反革命的必要的一部分。托洛茨基对这点有详细的论述：

“在家庭胜利恢复的同时，卢布也恢复了——真是天缘巧合！——这是国家在物质和文化方面都遭到破产而引起的后果。领导人不敢公开说，‘我们已为事实证明，还太穷太无知，不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社会主义关系，我们的儿子和孙子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却强迫人民把破碎了的家庭外壳重新粘合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极刑的威胁下强迫人民承认家庭是胜利的社会主义的神圣核心。这种退却的程度是很难用眼睛来衡量的。”

——《被背叛了的革命》

官僚层否定布尔什维克不干涉人民私生活的政策，“消灭家庭”的理论被宣布为性生活放荡的根源；与此同时，到1930年代中期，推崇“好家庭主妇”的报导开始出现在苏联的媒体中。1936年《真理报》的一篇社论谴责一项没有私用独立厨房的住房计划为“左倾错误”和企图“人为地引进公共生活方式”。正如托洛茨基所说，“这种退却不仅具有令人厌恶的虚伪形式，而且比严峻的经济需要所要求的退却还要走得远得多。”

1936年的《家庭法典》将堕胎刑事化，给苏联妇女带来深重的苦难，造成堕胎妇女的死亡率急升。与此同时，政府开始给多生孩子的妇女授予“女英雄奖”，这时官员们裁定，在苏联“生活是快乐的”，妇女出于自私才会堕胎。1944年的《家庭法典》废除了对事实婚姻关系的承认、恢复“合法婚姻所生”这种屈辱人的地位、废除了男女同校教育，并禁止了确认生父的诉讼。直至1955年，堕胎才在苏联恢复了合法地位。

1991-92年：资本主义反革命践踏妇女

在1930年代托洛茨基预测，当经济发展需要从粗糙的数量增长转为质量的提高、从粗放到集约发展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官僚在经济战线上将陷入僵局。托洛茨基主张，“根据生产者及消费者的利益，从上到下，修正计划经济”（《过渡纲领》1938）。在1970和1980年代，主要地反映着世界帝国主义对苏联工人国家的不断压力，这些经济问题达到了危急的关头。

为实行温和的戈尔巴乔夫所不敢实行的复辟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需的苛刻政策，叶利钦在1991年8月夺取了政权。在此后的一年，在缺乏无产阶级反抗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反革命在俄国胜利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次世界历史性的失败。苏联被分裂成一系列互相敌



Corbis



NTVRU.com Archive

资本主义反革命的面目。左：1995年，车臣妇女为俄罗斯残暴占领的受害者而痛哭。上：资本主义俄罗斯无家可归的儿童。

对的民族主义政权。从此，除了最高层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外，人民的生活水平比以前坏得多，而受害特别严重的是妇女和儿童。俄国绝大部分人被打入极端贫穷和长期失业的境地。保育和协助母亲的广泛网络没有了、街童重新出现、卖淫现象猖獗，中亚妇女的地位则倒退了好几百年。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承认这样的严酷事实：在这些史无前例的失败面前，政治觉悟遭受了倒退。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解释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使其不被斯大林主义叛卖的污秽和资产阶级辩护士的谎言所沾染。这篇关于布尔什维克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的研究表明了，苏联即使在贫穷、帝国主义绞杀及其后斯大林主义堕落的情况下，在这方面可以达到的成就；这证明了一系列新的十月革命所缔造的世界集体计划经济，将给全世界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解放带来的伟大希望。对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未来——一种只有在将资本主义剥削

所滋生的深厚的不平等和压迫连根拔起之后，才能演化出来的新的生活方式——的长远历史观点的广度，托洛茨基有这样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从技术发展是进步的基本泉源这一点出发，而在生产力的动力这一基础上建立了共产主义纲领。如果你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星球会被某种宇宙灾难所毁灭，那末，你当然会拒绝共产主义前景以及其他许多事情。可是除了这种还有疑问的危险以外，没有任何科学根据为我们的技术、生产和文化的可能性事先规定一个框框。马克思主义对进步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顺便说一句，只是这一点，就使马克思主义毫不调和地反对宗教。”

“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应当是使人的经济力量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即生产劳动不再是一种负担，因而不需要任何刺激；同时，生活日用品的分配，在这种日用品日益丰富的情况下，除了还需要由教育、习惯和社会舆论来加以监督以外，再也不需要任何其它监督——这一点目前在任何富裕家庭或者‘还过得去’的寄宿舍都〔已做到的一样〕。”

——《被背叛了的革命》■



现可购买过去各期。请将支票付给并寄给： Spartacist Pub. Co., Box 1377 GPO, New York, NY 10116美国